

跨文化交际中的图式错位现象分析

范冰

摘要：鉴于图式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有研究者将文化图式分为图式重合、图式冲突和图式缺省三类。然而，这种分类虽较为合理，但却不够全面、完整，忽视了另一种具体情形，故再补充一类——图式错位。文章拟以图式理论为依据，分析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图式错位现象。

关键词：图式；文化图式；图式错位

作者简介：范冰，女，讲师。（浙江传媒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4-0113-04

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们一直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图式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根据图式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及外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影响，许秀云和曹春春把文化图式分为三类：图式重合、图式冲突和图式缺省^[1]。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和自己原有的相关图式做比较，如果新信息和已有图式完全重合（即图式重合），就会进一步加强原有图式。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同一事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图式，有些图式甚至是某种文化所特有的。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在交际时，如果交际双方的图式不同（即图式冲突），或一方没有另一方所交际的图式（即图式缺省），就会给交际带来困难。这一图式分类比较合理，也被众多研究者广泛引用。然而，笔者认为上述分类其实并不完整，忽略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另一种具体情形。为使图式的分类更加全面、清晰，笔者试再补充一类——图式错位。本文将以图式理论为依据，分析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图式错位现象。

一、图式的概念

图式理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1781年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并正式提出“图式”（schema）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经验在记忆中集结，进而形成更高次序的概念^[2]。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 Bartlett 首次将图式理论引入现代心理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在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和广泛应用。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为图式下了各种定义，例如 Rumelhart 把图式看作“构成认知的建筑砌块”^[3]；Anderson 认为图式是“抽象的知识结构”^[4]；Cook 把图式定义为“典型事例的心理表征”^[5]，等等。这些定义虽各有不同，但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图式是作为经过抽象和概括了的背景知识存储在人们记忆中的一种认知结构。

正由于图式是经过抽象和概括了的背景知识，因此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以及日常交际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拥有不同经历的人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图式。假如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使之拥有某些经历，那么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每个人都会形成这类文化图式。根据 Nishida 的定义，文化图式包括有关常见情境和行为习惯的一切知识，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相关信息；还包括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或问题解决策略，以及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普遍发生的情感经历^[6]。鉴于文化图式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Nishida 将其分为八大社会交往图式（Primary Social Interaction schemas），即概念图

式、人物图式、自我图式、角色图式、环境图式、程序图式、策略图式和情感图式。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就是将一方文化中的 PSI 图式转换成另一方的 PSI 图式,并形成新的 PSI 图式的过程。

人类的认知活动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人的大脑在接受周围环境的刺激时会修正自身的神经系统,以制造出适应环境的神经回路。我们可以把“图式”假想为神经回路,其加工的过程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图式是在以往经验的旧知识与新信息相互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同化”(assimilation)与“顺应”(accomodation)形成的,是以往经验的积极组织。“同化”和“顺应”是皮亚杰(Piaget)图式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同化”就是把外界的信息纳入已有的图式,使图式不断扩大。“顺应”则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图式不能再同化新信息,而必须通过调整改造才能建立新的图式。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把原有的图式加以改造,使其可以接受外界的信息;二是建构一个新的图式,以接纳新信息于图式中。跨文化交际中的图式重合是对新信息的完全“同化”;图式冲突和图式缺省都要求重新建构新的图式,属于第二种“顺应”。而图式错位指的是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时虽然会有相同或类似的观念,但由于文化的差异难免会形成不同的图式。它需要交际双方调整头脑中原有的图式以接受新的信息,属于第一种“顺应”。这一“顺应”过程类似于英国翻译家 Baker 提出的“文化置换”(cultural substitution)策略,即源语中特定文化概念的表述可以替换成不具备同样的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但能对目标读者造成近似影响的目的语^[7]。这样,就很容易激活对方头脑中已有的文化图式,从而引起情感共鸣。

二、图式错位的类别

在英汉两种文化中,常见的图式错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颜色、动物、植物及其他类。

(一) 颜色错位

不同的民族语言对颜色词的分类往往不同。颜色词的出现、颜色秩序的分割,首先是特定语言集团文化环境的需要^[8]。对同一种颜色,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或语义联想,因此倾向于以不同的颜色图式表达相近的意思。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的颜色图式可能用于描述同一种物质的客观表象。比如中国人说的“红茶”对应的正是西方人的“black tea”,“红糖”却是“brown sugar”,“黑面包”也叫“brown bread”,“黑里透红”是“as brown as a berry”,“紫铜”则是“red copper”,“青一块,紫一块”是“black and blue”。再如“green”的图式在英语中有着丰富的联想意义,可以表示“嫉妒”,像“green-eyed”对应的正是汉语中的“眼红”。据说嫉妒、不悦或疾病会导致人体胆汁分泌过多,其症状之一就是脸色苍白,眼睛发青,故短语“green around/about the gills”即“面色苍白”之意。类似的还有“blue”的图式,除喻指“忧郁、沮丧、情绪低落”以外,还有“淫猥的,下流的”之意,所以“blue movie/jokes”对应着汉语“黄色电影/笑话”。

此外,历史背景的差异也会引起颜色图式的错位现象。比如黄色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代表尊贵、庄严、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西方人崇尚紫色,古希腊、古罗马皇帝、执政官以及将军都身着紫色。紫色象征着王位和王权,象征着显赫的地位。因此英语“be raised to the purple”类似于汉语“黄袍加身”的意思。另按中国古代历法家的说法,“黄道”是吉日。而在西方人眼中,白色历来是幸运、纯洁的象征,所以“white days”近似与我们的“黄道吉日”。再如颜色图式“black”在英语中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耶稣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殉难,因此英语有 black Friday 的说法(指大灾大难、凶险不祥的日子)，“black”也因此带有“不幸、灾难、邪恶、愤怒、悲伤”等意义。我们头脑中假若有了关于“black”引申义的图式,也就不难发现“black in the face”恰好对应汉语“(气得)脸色铁青”,“give sb. a black look”对应“(狠狠地)白了某人一眼”了。

(二) 动物错位

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积累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词汇, 其中有一类词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语言学家所说的“动物词”。然而中西方民族由于迥异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对大多数动物的看法相去甚远, 因此也常常会以不同的动物图式表达同一概念。

例如狮子(lion)在西方人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被视为百兽之王, 象征着庄严、威武、勇猛, 还出现在英国的国徽之上。虽说对中国人而言, “狮子”的图式也包含着“凶猛、威严”的联想意义, 但远不及西方人强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王者风范”的当属老虎。因此, 英语“a lion in the way”, “beard the lion”, “an ass in a lion's skin”分别对应着汉语的“拦路虎”、“虎口拔牙”、“羊质虎皮”。

再如马(horse)无论在中西方都是一种载人运货的交通工具。不同的是, 英民族早期的农牧经济使之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汉民族文化中, 牛才是勤勤恳恳的农作生产好帮手。所以英语“as strong as a horse”, “eat like a horse”, “flog a willing horse”以及“talk horse”分别对应着汉语“力大如牛”、“食量大如牛”、“鞭打快牛”和“吹牛”。

类似的错位现象还有与鹅(goose)有关的短语, 像“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杀鸡取卵), “goose flesh”(鸡皮疙瘩); 与老鼠(rat)有关的, 如“wet as a drowned rat”(湿得像只落汤鸡), “like a rat in a hole”(瓮中之鳖), “rats desert a falling house”(树倒猢猻散); 与鱼(fish)有关的, 像“drink like a fish”(牛饮), “(to be)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宁当鸡头, 勿做凤尾), “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 与鸟(bird)有关的, 如“birds of a feather”(一丘之貉),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双雕); 与羊(sheep)有关的, 如“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害群之马),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群龙无首); 和猫(cat)有关的, 如“like a cat on hot bricks”(热锅上的蚂蚁),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露出马脚), 等等。

(三) 植物错位

千百年来中西方民族不仅都把植物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和习性赋以不同的喻义。由于英民族农牧业历史悠久, 植被分布范围广, 环境意识强, 他们目睹、接触、观察、了解熟悉植物机会多, 植物种类多; 英语民族众多, 文化多元, 英语敞开大门兼收并蓄, 汉语则输出多吸收少^[9], 因此英语中蕴含文化联想意义的植物词要多于汉语。而且, 英汉民族所处地理环境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植物图式的联想意义在两种语言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江南气候温暖湿润, 大部分地区都适合竹子生长, 文人雅士们也喜欢种竹, 竹子随处可见。竹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竹子生命力十分顽强, 往往在多雨的春天抽出许多新芽, 因此汉语中才有“雨后春笋”一说, 比喻事物的大量涌现和蓬勃发展。而竹子在西方却不常见, 并不能引起他们的语义联想, 反倒是蘑菇的图式承载着这一联想意义, 于是“spring up like mushrooms”正对应着“雨后春笋”的意思。

再如百合花(lily)在西方人眼中为圣洁的象征, 是祥瑞之物。公元约1000年前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寺庙柱顶上, 就以百合花作装饰。12世纪时法国还曾把百合花作为国徽的图案。百合的图式蕴含着纯洁、白皙、娇嫩的意义。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别名芙蓉、荷花)被视作“花中君子”, 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就有“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赞誉。故英语“as white as a lily”对应的正是“如莲花般洁白无瑕”。

土豆(potato)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食品, 在英语国家的饮食中尤为常见, 既做蔬菜, 又用做主食。土豆的普遍性使其在英语语言中也有相应的体现, 如“hot potato”(烫手的山芋), “potatoes and point”(粗茶淡饭)。其他产生错位的植物图式还有“as bitter as wormwood”(苦若黄连), “a grain of wheat in a

bushel of chaff”(沧海一粟),“some prefer turnips and others pears”(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等等。

(四) 其他错位

英汉语言中除却上述三类以外的图式错位现象不胜枚举。这些语言都包含着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几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智慧结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有些错位现象虽然在一种语言中也涉及颜色或动、植物图式,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以其他物质为载体表达相似的涵义,在此也归入其他类。比如成语“昙花一现”比喻转瞬即逝的事物,恰好对应英语“a flash in the pan”;英语“the apple of one's eye”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掌上明珠”;俗语“拍马屁”却对应英语“polish the apple”;而当某人“play gooseberry”那就意味着“当电灯泡”(不识趣地夹在一对情侣中间)。

此外,还有不少和饮食相关的错位现象,如“tread upon eggs”(如履薄冰),“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good wine needs no bush”(好酒不怕巷子深);和身体部位相关的,如“wet behind the ears”(乳臭未干),“with one's heart in one's mouth”(提心吊胆);和生活用品相关的,如“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五十步笑百步),“new brooms sweep 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和水火相关的,如“no smoke without fire”(无风不起浪),“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进退维谷);和建筑园林相关的,如“castles in the air”(空中楼阁),“throw a stone in one's own garden”(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图式错位现象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比比皆是。有些只需要略微加以调整就能激活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图式;有些仅靠简单地望文生义容易造成误解,甚至造成双方交际障碍。对此,我们首先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改造头脑中原有的图式,以增强自身的语言敏感度。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理解掌握异域文化图式的有效途径。当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后,不仅能更好地明晰言语的意义,而且能深刻领会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所以,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建构文化图式,拓宽知识面,对于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 许秀云,曹春春.图式与文化——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0(3):72-75.
- [2] Palmquist, S. Kant's System of Perspectives: An architecton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M].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298.
- [3] Rumelhart, D. E. Schemata: 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 [A]. In R. J. Spiro, B. C. Bruce & W. F. Brewer (Eds.), Th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0:33-58.
- [4] Anderson, R. C. and Pearson, P. D. A schema-theoretic view of basic process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 In P. Carrel, J. Devine & D. Eskey (Eds.), 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37-55.
- [5] Cook, G. Discourse(Language Teaching: A Scheme for Teacher Education)[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69.
- [6] Nishida, H. Cultural schema theory [A]. In W. B. Gudykunst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1999:404.
- [7]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2:31.
- [8] 吴越民. 英汉颜色词的语义联想及其语用比较[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8(1):101.
- [9] 廖光蓉. 英汉文化植物词对比[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5(4):6.